

宋代城镇考古的发现与研究^{*}

王子奇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宋代城镇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发轫于民国时期北平历史博物馆对巨鹿故城的发掘^①。但限于各方面的条件,当时有计划的、以了解宋代城镇为学术目的的考古工作并未展开。解放后,随着新中国考古工作的开展,宋代城镇考古工作随之起步,学术界亦展开了有关研究。本文就现已刊布的材料,择要从都城和地方城镇两方面分述之。

一、宋代都城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北宋建都开封,称东京城,相沿于唐代汴州城,叠压在今天的开封城之下。由于历代黄河水患淤沙堆积,汴州城深埋于地下,北宋文化层距地表深达8~11米,加之地下水位较高,使得北宋东京城的考古工作长期难以开展。1981年春,开封旧城区东北隅龙庭东湖(潘湖)在清淤过程中,发现了明代周王府的部分遗迹和叠压于其下的早期遗迹,由此拉开了宋代开封城考古工作的序幕。此后,对开封城进行了一系列考古工作。

勘探、实测了北宋东京外城,基本探清了外城的方位、范围和轮廓,并发现了部分城门或可能是城门的遗迹,对局部城墙和个别城门做了发掘和解剖,解决了外城城墙的年代问题,了解了外城的残存高度和宽度^②。

勘探、实测了北宋东京内城,基本确定了内城的方位、范围和轮廓,确定了内城正南门朱雀门和汴河西角门子的位置。通过北墙西段的局部解剖,了解了明周王府萧墙北墙、金皇宮北墙和宋内城北墙的叠压关系,了解到宋内城城墙下尚叠压早期城墙遗迹^③。

* 本文是郑州中华之源与嵩山文明研究会委托重大课题“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史——以中原地区为中心”(课题编号:ZD-5)和2009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北方地区宋代新建城市的考古研究”(项目批准号:09BKG005)成果之一。

① 《钜鹿宋代故城发掘记略》,《国立历史博物馆丛刊》第一年第一册,1926年。参见张保卿:《钜鹿故城的发现及相关研究》,北京大学本科学位论文,2014年;又见《华夏考古》2016年第3期。

② 丘刚、孙新民:《北宋东京外城的初步勘探与试掘》,《文物》1992年第12期;丘刚:《北宋东京外城的城墙和城门》,《中原文物》1986年第4期,以上两文后收入《开封考古发现与研究》,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葛奇峰:《北宋都城新郑门遗址与开封“城摞城”》,《大众考古》2014年第10期;葛奇峰:《北宋东京城新郑门遗址出土娱乐类文物品赏》,《文物鉴定与鉴赏》2015年第6期。

③ 开封宋城考古队:《北宋东京内城的初步勘探与测试》,《文物》1996年第5期,后收入《开封考古发现与研究》。

勘探、实测了北宋东京皇宫,探明了皇宫的方位和四至,探出了北、东、南三面城墙上的三处缺口,推测为门址。其中,南侧明代周王府正南门下,叠压着一处早期门址。对城墙局部进行了试掘,确认了北宋皇宫北墙叠压于明周王府紫禁城北墙之下,其下叠压有早期的夯土遗迹。此外,在明代周王府正南门之南、今新街口附近发现了一处三层叠压的遗迹,上两层判断为明周王府萧墙正南门“午门”和金皇宫正门“五门”,最下层建筑遗迹的性质尚待确定^①。

此外,还对城内外的一些重要遗迹进行了勘探和发掘。勘探、发掘了汴河与御路相交处的古州桥遗址,了解了古州桥的形制^②。勘探了外城西墙外的金明池,探明了金明池的位置和大体范围,了解了水心岛和水心五殿的位置、池南岸临水殿的位置和汴河注水门的位置^③。对蔡河进行了调查与勘探,明确了蔡河的大体走向,确定了“广利水门”的位置和蔡河与御街相交处“龙津桥”的位置^④。

通过这些考古发现,可以大体明了北宋东京城的布局(图一)。北宋东京城目前勘探发现了三重城垣,重重相套。依据考古勘察的发现——城市自外城南熏门至内城朱雀门至州桥至皇宫两处建筑及“龙亭大殿”遗迹,可以确知北宋东京城贯穿内外三重城垣的中轴线,且这一中轴线沿用至今。内城沿自唐汴州城,尚能依稀看出“坊”的痕迹;外城由于考古工作的限制,还不清楚道路情况和城市格局,但从文献和传世绘画可知,至北宋晚期已经采用了开放的街巷制,临街贸易,城市面貌大为改观。但仍有一些关键问题尚不清楚,如北宋皇城与宫城的关系及其布局,北宋内城及唐代汴州城的关系和布局等问题,都有待未来有条件时进一步的考古工作。

临安城是南宋都城,遗址被今天杭州市所叠压。对临安城的考古勘探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通过历年来对南宋临安城的考古勘探和试掘工作,发现了外城北城墙、西城墙、南城墙、东城墙的部分遗迹,并对局部做了解剖,基本确定了宋代临安外城城墙的范围和位置^⑤。

先后数次对皇城进行了勘探,陆续确定了皇城北墙、西北角、南墙、西墙和东墙位置。2004年勘探后,基本确定了皇城的范围,形成了一份南宋皇城范围示意图^⑥。勘探确认了

① 丘刚、董祥:《北宋东京皇城的初步勘探与试掘》,《开封考古发现与研究》;开封宋城考古队:《明周王府紫禁城的初步勘探与发掘》,《文物》1999年第12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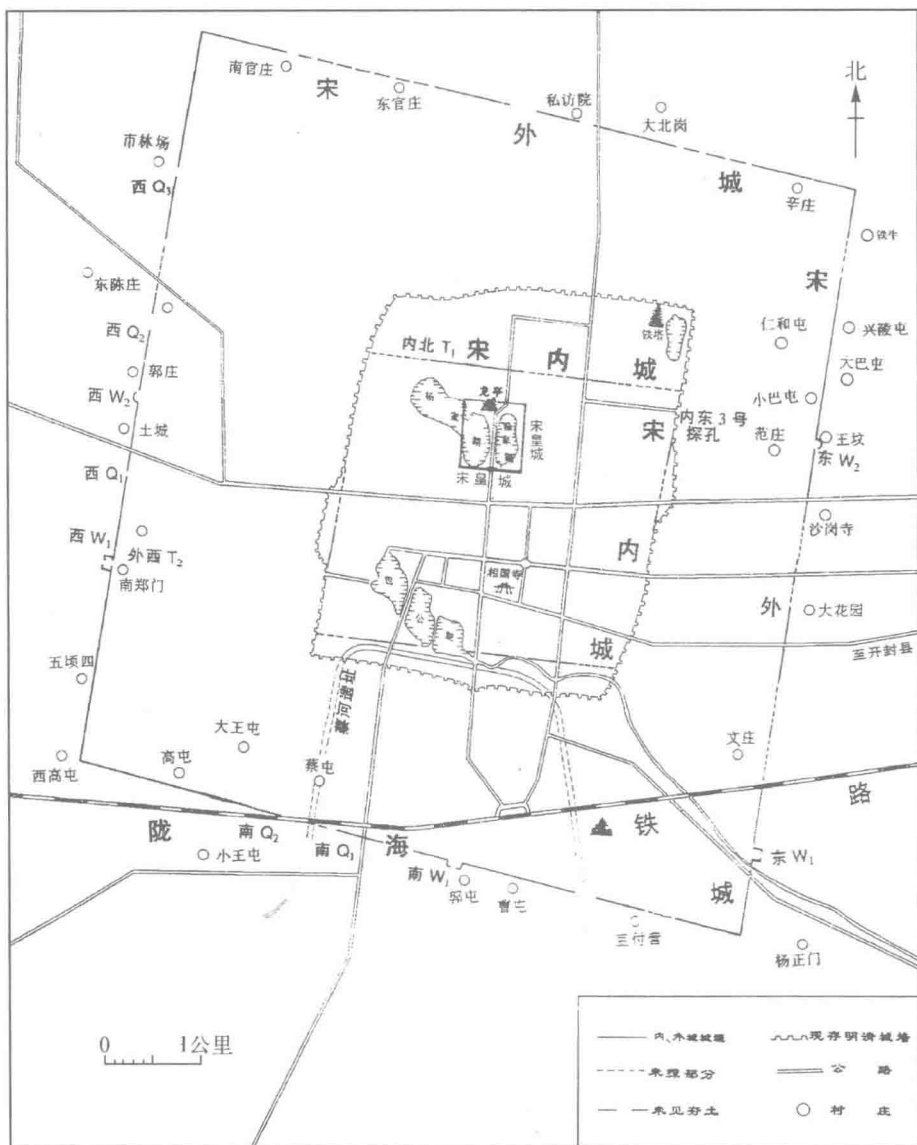
② 李克修、董祥:《开封古州桥勘探试掘简报》,《开封文博》1990年第1、2期合刊,后收入《开封考古发现与研究》。

③ 丘刚、李合群:《北宋东京金明池的营建布局与初步勘探》,《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期,后收入《开封考古发现与研究》。

④ 刘春迎:《宋东京城遗址内蔡河故道的初步勘探》,《开封考古发现与研究》。

⑤ 唐俊杰:《武林旧事:南宋临安城考古的主要收获》,见《南宋史及南宋都城临安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67~873页;唐俊杰、杜正贤:《南宋临安城考古》第三章“御街与城墙遗址”,杭州:杭州出版社,2008年,第45~49页。

⑥ 浙江文物考古研究所:《杭州市南宋临安城考察》,见《中国考古学年鉴·1985年》,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149、150页;李德金:《南宋临安城遗址》,见《中国考古学年鉴·1986年》,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127页;李德金:《南宋临安城皇城遗址》,见《中国考古学年鉴·1993年》,北京:文物出版社,1995年,第146、147页;朱岩石、何利群:《二〇〇四年度杭州南宋临安皇城考古取得突破性进展》,《中国文物报》2004年11月17日第1版;《杭州南宋临安城皇城考古新收获》,见《2004年中国重要考古发现》,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年。



图一 北宋东京城平面实测图

皇城正门丽正门的位置,明确了丽正门与和宁门不处于同一直线。发现了皇城内多处建筑基址,根据其建筑规制可以大致分为核心宫殿区、东宫及一般建筑等。但皇城的平面格局、宫苑的确切位置和建筑形制等问题尚不明^①。

在城内先后四次在杭州卷烟厂、太庙东围墙外、严官巷东段北侧和中山中路 112 号发现了南宋御街遗迹,进行了揭露发掘。明确了南宋御街的走向,其中大部分和今天中山路重合,了解了南宋御街的尺度和砌筑方式^②。

① 唐俊杰、杜正贤:《南宋临安城考古》第二章“皇城遗址”,第 17~25 页。

② 杭州市文物考古所:《南宋御街遗址》,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 年。

还在城内发现、发掘了多处重要遗址。先后对德寿宫遗址进行了数次发掘,发掘了南宫墙及其北侧建筑群,东宫墙,西宫墙及便门,水渠、水闸和水池等遗迹^①。1995 年对太庙遗址进行了发掘,清理了太庙东围墙、东门址和大型夯土建筑台基等遗迹^②。先后发掘了三省六部官署的建筑基址、水沟、暗井、砖砌道路遗迹和围墙遗迹,确认了三省六部官署的位置和北界^③。发现、发掘了南宋五府官署遗址的大型夯土台基、散水等遗迹^④。发掘了临安府治遗址,发掘出了厅堂、天井、西厢房、庭院、水井等遗迹。发掘了位于府治之北的府学遗址,清理了夯土地面、砖砌夹道、砖墙、散水、廊庑和天井等遗迹^⑤。

此外,还发掘了恭圣仁烈皇后宅遗址,清理了庭院和宅园等遗迹^⑥。发掘了明代镇海楼即南宋朝天门遗址^⑦,白马庙、永福寺、姚园寺、雷峰塔等寺庙遗址^⑧。发掘了两处官窑遗址,位于闸口乌龟山西麓的郊坛下官窑和位于万松岭南的老虎洞窑址^⑨,还发掘了惠民路、白马庙巷等制药遗址^⑩和杭州卷烟厂南宋船坞遗址^⑪。

依据这些考古勘探和发掘的成果,结合历史文献和舆图,可以参照古今重叠型城址的复原方法初步复原南宋临安城的布局并了解其特点^⑫。临安城是一座由外城、皇城两重城垣组成的、由地方城市改建而成的都城,外城坐南朝北,平面不甚规整,呈近似的长方形,皇城依山而建偏居一隅。外城以内以纵街横巷式的街道系统为基本规划,采用开放式的街巷制。都城礼制性受到旧城束缚未能充分展开(图二)。

北宋时期西京洛阳仍然是一座重要的城市。以往对洛阳的考古工作主要集中在汉魏故城和隋唐东都城,对继承了隋唐东都城的北宋西京关注较少。对宋代西京的考古发掘,不少是同隋唐洛阳城考古工作一起进行的,如对郭城定鼎门、长夏门等门址的勘探和发掘工作,对城内里坊区主要街道、水渠、里坊的勘探和发掘工作。除此以外的工作不少集中在隋唐洛阳城西北隅皇城、宫城一区,在隋唐洛阳城宫城一区发现、发掘了若干门址和宋代大型建筑,在隋唐东都东城内还发掘了北宋时期扩建的一座“过梁式”木构城门和一处宋代衙署遗址,为了解西京宫城的格局、北宋时期大型衙署的布局 and 木构过梁式城门的营

① 唐俊杰、杜正贤:《南宋临安城考古》第二章“皇城遗址”,第 26~35 页;浙江文物考古研究所:《杭州市南宋临安城考察》,见《中国考古学年鉴·1985 年》,第 149、150 页。

② 杭州市文物考古所:《南宋太庙遗址》,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 年。

③ 唐俊杰、杜正贤:《南宋临安城考古》第五章“衙署遗址”,第 71~79 页;浙江文物考古研究所:《杭州市南宋临安城考察》,见《中国考古学年鉴·1985 年》,第 149、150 页;杭州市文物考古所:《杭州发现南宋六部官衙遗址》,《杭州考古》1995 年 12 月。

④ 唐俊杰、杜正贤:《南宋临安城考古》第五章“衙署遗址”,第 86~89 页。

⑤ 杭州市文物考古所:《南宋临安府治与府学遗址》,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 年。

⑥ 杭州市文物考古所:《南宋恭圣仁烈皇后宅遗址》,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 年。

⑦ 唐俊杰、杜正贤:《南宋临安城考古》第九章“其他遗址”,第 129~131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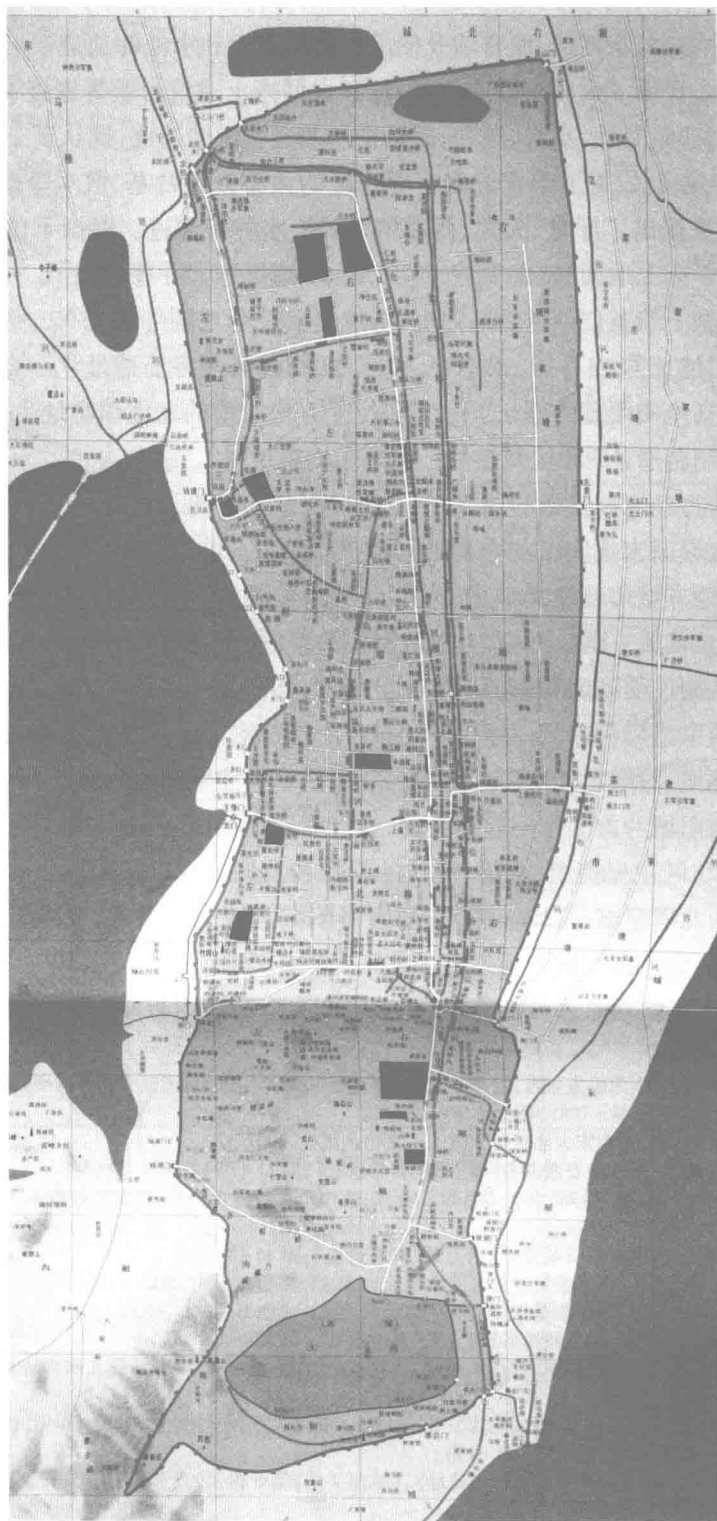
⑧ 唐俊杰、杜正贤:《南宋临安城考古》第四章“寺庙遗址”,第 59~70 页;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雷峰塔遗址》,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 年。

⑨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南宋官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 年;杭州市文物考古所:《杭州老虎洞南宋官窑址》,《文物》2002 年第 10 期。

⑩ 李署蕾:《杭州白马庙巷南宋制药作坊遗址》,《杭州文博》第 6 辑,2007 年;唐俊杰、杜正贤:《南宋临安城考古》第八章“制药遗址”,第 59~70 页。

⑪ 梁宝华:《杭州卷烟厂南宋船坞遗迹发掘报告》,《杭州文博》第 2 辑,2005 年。

⑫ 参看刘未:《南宋临安城复原研究》,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 年。



图二 南宋临安城复原图

造等问题提供了新的材料^①。总的来说,隋唐至北宋洛阳城格局没有重大变化。

二、宋代地方城镇的考古调查与研究

相对于都城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宋代地方城镇的考古工作,则显得较为薄弱。

地方城镇中,考古工作较充分的以扬州城较有代表性。扬州城自 20 世纪 60 年代尤其 1986 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南京博物院、扬州市文化局联合组成扬州唐城考古工作队以来,陆续进行了大量的考古工作,勘探了自东周至明清不同时期的城址范围和平面布局,发掘了不同时期不同形制的城门(水门、水涵洞),勘探了城门之间的道路,并发掘了城内的部分遗址^②。通过数十年来的考古发现,基本明确了宋代扬州城是在唐代扬州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由宋大城、堡城(宝祐城)、宋夹城三部分组成。五代后周即唐代罗城东南隅兴筑周小城,北宋依其旧,是为宋大城。南宋时期扬州成为宋金、宋蒙对抗的前线,因军事需要在唐子城西半隅筑堡城,后又在堡城和宋大城之间即唐罗城西北部筑夹城,形成扬州“宋三城”的布局(图三)。从考古发现看,宋三城应基本沿用了隋唐时期扬州城的道路格局。宋大城除道路格局外,城内水系和部分城门也沿用自唐代扬州罗城。这些又部分为后来的扬州明新城和明旧城所沿用,延续到今天^③。

江西赣州城建于章、贡二水合流处,平面略呈三角形,是一座保存较好的地方城址(图四)。经过考古调查,赣州城址在南朝时期在今址固定下来,唐代赣州城横街、阳街形成丁字街布局,在横街北部一带建有子城。五代后梁时期经过扩建,奠定了今日赣州城的基础,至宋代又形成了城内的四条主要街道(阴街、斜街、长街、剑街)。由此构成了城内六

①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隋唐东都应天门遗址发掘简报》,《中原文物》1988年第3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唐城工作队:《河南洛阳市隋唐东都应天门遗址 2001~2002 年发掘简报》,《考古》2007年第5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唐城队:《河南洛阳市唐宫中路宋代大型殿址的发掘》,《考古》1999年第3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唐城工作队:《河南洛阳唐宫路北宋遗迹发掘简报》,《考古》1999年第12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唐城队:《北宋西京洛阳监护城壕的发掘》,《考古》2004年第1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唐城队:《河南洛阳市中州路北唐宋建筑基址发掘简报》,《考古》2005年第2期;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发现宋代门址》,《文物》1992年第3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唐城队:《洛阳宋代衙署庭院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6年第6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唐城队:《洛阳隋唐东都城 1982~1986 年考古工作纪要》,《考古》1989年第3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隋唐洛阳城:1959~2001 年考古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 年。

② 南京博物院发掘工作组等:《扬州唐城遗址 1975 年考古工作简报》,《文物》1977年第9期;罗宗真:《唐代扬州经济繁荣初探——1975~1978 年手工业作坊遗址的考古收获》,《扬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1期;南京博物院:《扬州古城 1978 年调查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第9期;南京博物院:《扬州唐代寺庙遗址的发现和发掘》,《文物》1980年第3期;扬州博物馆:《扬州唐代木桥遗址清理简报》,《文物》1980年第3期;南京博物院:《扬州唐城手工业作坊遗址第二、三次发掘简报》,《文物》1980年第3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编著:《扬州城 1987~1998 年考古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编著:《扬州蜀岗古代城址考古勘探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编著:《扬州城遗址考古发掘报告:1999~2013 年》,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 年。

③ 蒋忠义:《隋唐宋明扬州城的复原与研究》,见《中国考古学论丛——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建所 40 周年纪念》,北京:科学出版社,1993 年;李裕群:《隋唐时代的扬州城》,《考古》2003年第3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编著:《扬州城 1987~1998 年考古发掘报告》第六章“结语”,第 254~264 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编著:《扬州城遗址考古发掘报告:1999~2013 年》第四章“结语”第三至四节,第 285~296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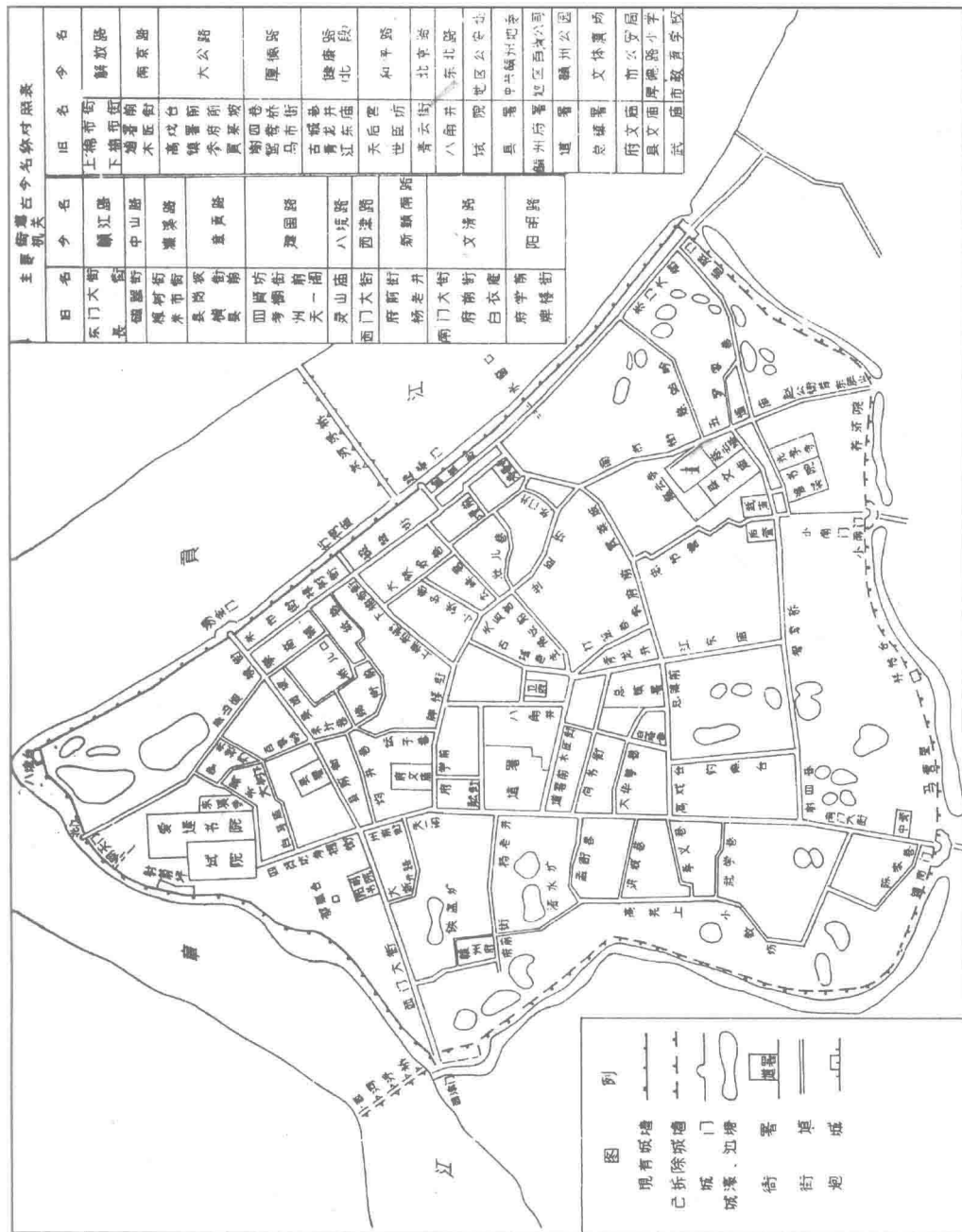
图三 宋扬州城址格局图

条主要街道,主街之间又有若干短街相连的格局,沿用至今^①。这样主街大体平行,其间以短街相连的格局,正是宋以来流行的纵街长巷式布局的反映,只是由于赣州地形的限制而呈现不规则的走向。

镇江城是唐宋时期的润州城,子城沿用自孙吴以来的“铁瓮城”,唐乾符年间展筑罗城,奠定了唐宋润州城的规模,城址平面呈不规则形;南宋嘉定年间整饬罗城,对城垣的范围作了一定调整^②(图五)。近年来考古调查、勘探了润州的子城和罗城,发掘了多处城垣

① 赣州市博物馆:《赣州市发现宋元时代遗址》,《江西历史文物》1982年第4期;赣州市博物馆:《赣州铭文城砖小考》,《江西历史文物》1984年第2期;李海根、刘芳义:《赣州古城调查简报》,《文物》1993年第3期;余家栋、张文江、李荣华:《江西赣州市古城墙试掘简报》,《南方文物》1995年第1期;张嗣介:《赣州北宋“第二务”砖窑清理简报》,《南方文物》1996年第2期;赣南地方历史文化研究室:《赣州古城墙铭文城砖简介》,《南方文物》2001年第4期;韩振飞:《赣州城的历史变迁》,《南方文物》2001年第4期。

② 张小军:《镇江唐宋罗城的有关问题研究》,《镇江高专学报》2013年第3期。刘建国认为唐宋时期润州罗城的规模基本一致,且花山湾古城主体年代早于唐,部分为唐大和年间展筑的东夹城。请参刘建国:《古城三部曲——镇江城市考古》第五章“润州城市的扩建”第二节“唐时润州三重城”、第八章“城垣、河道及市井”第一节“镇江府罗城”,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114~120、185~191页;刘建国主编:《名城地下的名城》第四章“历代城垣”。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2~41页。



遗迹和铁瓮城南门及定波门遗址。在子城内发现、发掘了六朝、唐宋互相叠压的衙署基址,在子城外还发掘了大量官署建筑遗址。发现、发掘了罗城内外的道路、排水设施、涵洞、渡口、码头、桥梁、手工业作坊、粮仓、佛寺等遗迹^①。但从目前的考古工作来看,花山湾古城的性质尚有一定疑义,其与唐代罗城的关系尚不能完全肯定,唐宋时期的罗城范围尚存在一定争议,城市格局由于工作所限尚不清楚。

唐宋时期的罗州城即汉以来蕲春城的治所所在,位于今湖北省蕲春县。经过考古调查与发掘,罗州城整体呈一不规则的圆角长方形,内外两重城垣,第一重城位于第二重城中部偏西北。从考古发掘的遗迹看,第一重城的始建年代应是战国至汉代,是汉代蕲春县的治所。第二重城的始建年代为隋唐时期,历经两宋屡次修筑,应是唐宋时期罗州城的治所。唐宋时期内城(第一重城)仍然使用,外城(第二重城)东西宽 950、南北长 1 350 米,周长约 4.6 公里。外城内还发现了一条南北走向的道路遗迹(图六)。发掘者推测罗州城应是一座城内布置四个坊的较小的州城,而内城中的王城部分是唐宋时期的衙署所在^②。

一些重要的沿海对外贸易城市,也陆续做了一些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泉州城唐代迁至今址,唐代泉州城为方形,四门,十字街,周围三里。南唐以原唐城为子城,外筑罗城,泉州城市规模大为扩展,城址呈一不规则的梯形,五代末期又在城西北角和东北角陆续增筑,北宋时期大体沿用了五代泉州城的规模。南宋时期泉州城展筑“翼城”,将原城外南部贸易繁荣的地区包入城内,城址约呈一三角形^③(图七)。泉州作为宋元时期对外交通贸易的重要港口,陆续发现了一些沉船和码头遗迹以及与中西交流有关的建筑、石刻、墓葬等^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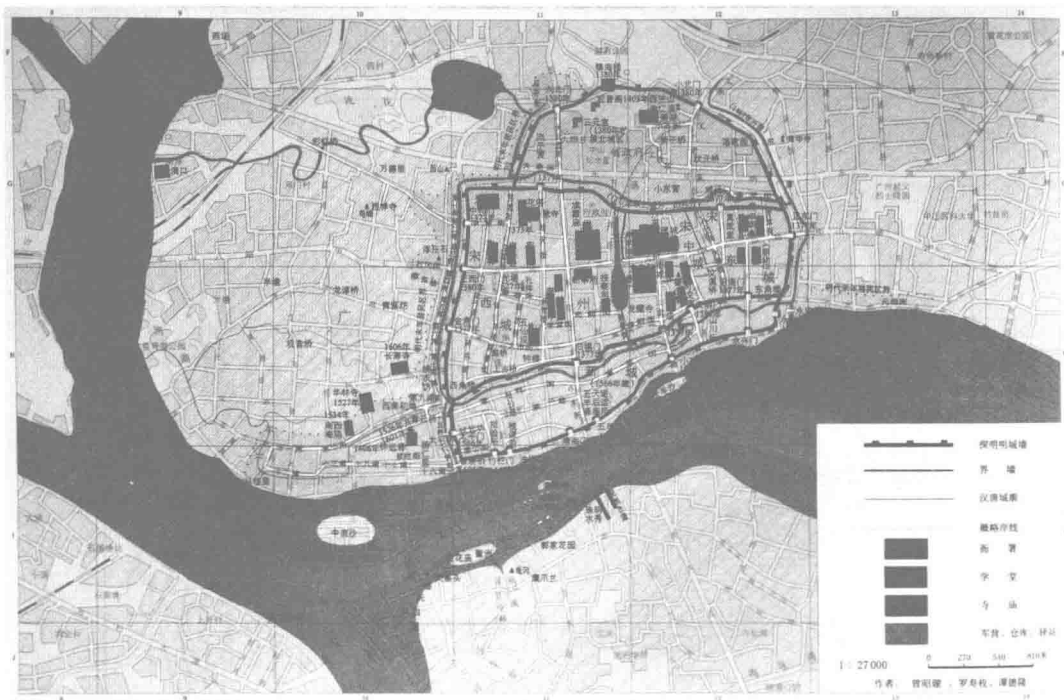
① 江苏省文物工作队镇江分队、镇江市博物馆:《江苏镇江甘露寺铁塔塔基发掘记》,《考古》1961年第6期;镇江博物馆:《镇江市东晋晋陵罗城的调查和试掘》,《考古》1986年第5期;镇江博物馆考古部:《建馆三十年来的考古工作》,《东南文化》1988年第5期;镇江古城考古所:《铁瓮城考古发掘纪要》,《南方文物》1995年第4期;镇江古城考古所:《镇江市大市口宋代水井清理简报》,《南方文物》1996年第1期;镇江六朝唐宋古城考古队:《江苏镇江市环城东路宋代遗存的发掘》,《考古》1998年第12期;镇江六朝唐宋古城考古队:《江苏镇江市花山湾古城遗址1991年发掘简报》,《考古》1999年第3期;铁瓮城考古队:《江苏镇江市铁瓮城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10年第5期;镇江博物馆:《镇江唐宋罗城西垣考古勘探与发掘报告》,见《印记与重塑:镇江博物馆考古报告集(2001~2009)》,镇江:江苏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69~278页;镇江古城考古所、镇江博物馆:《镇江铁瓮城南门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10年第4期;镇江博物馆、镇江古城考古所:《江苏镇江西津渡遗址发掘简报》,《东南文化》2011年第1期;南京博物院、镇江博物馆:《江苏镇江双井路宋元粮仓遗址考古发掘简报》,《东南文化》2011年第5期;镇江博物馆:《江苏镇江花山湾古城遗址2010年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12年第2期。

② 黄冈市博物馆等编著:《罗州城与汉墓》,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年;黄冈市博物馆、湖北省文物总店编著:《蕲春罗州城——2001年发掘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年。

③ 庄为玠:《泉州历代城址的探索》,见《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庄景辉:《泉州子城址考》,见《泉州港考古与海外交通史研究》,长沙:岳麓书社,2006年。

④ 庄为玠:《宋元明泉州港的中外交通史迹》,《厦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56年第1期;庄为玠:《续谈泉州港新发现的中外交通史迹》,《考古通讯》1958年第8期;夏鼐:《两种文字合璧的泉州也里可温(景教)墓碑》,《考古》1981年第1期;福建省博物馆等:《泉州清净寺奉天坛基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1年第3期;吴文良原著,吴幼雄增订:《泉州宗教石刻(增订本)》,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年;泉州湾宋代海船发掘报告编写组:《泉州湾宋代海船发掘简报》,《文物》1975年第10期;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福建省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联合试掘组:《泉州法石古船试掘简报和初步探讨》,《自然科学史研究》1983年第2期;福建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考古队等:《泉州文兴、美山古码头发掘报告》,《福建文博》2003年第2期。





图八 宋至明广州城址演变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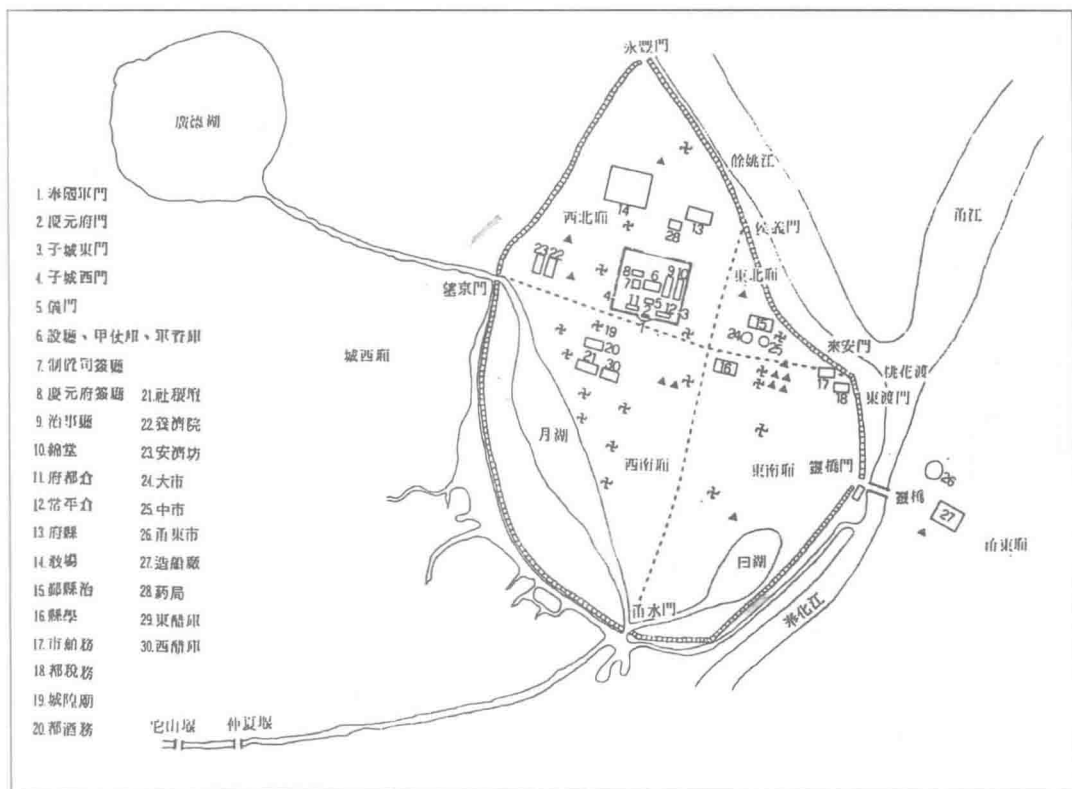
了宋代建筑遗迹;发掘了北京路遗址,确定了广州城自唐代以来沿用至民国时期的城市中轴线;发掘了中山六路黄金广场遗址、中山四路致美斋南汉与宋代建筑遗址,了解了广州旧城区西部和南汉皇宫区附近的文化遗存;发掘了大塘街宋代河堤遗址,了解了宋代广州东南城区的面貌^①;发掘了德政中路的南汉和宋代水关遗址,为研究广州唐宋古城的排水设施和确定南汉至宋时期古城南界提供了材料;发掘了中山五路与教育路交汇处的西湖堤坝遗址,是了解广州宋代筑堤的重要实例^②。

宁波城是唐宋时期的明州城,也是一座比较重要的对外商贸城市。今天的宁波城发展始于唐长庆元年(公元821年)移州治于三江口、筑子城。近年来对唐宋明州的子城遗址进行了考古勘探和发掘,基本搞清了唐宋子城的范围和构筑工艺^③(图九)。唐乾宁年间展筑罗城,奠定了唐宋时期明州城的规模。近年也对多处罗城城墙进行了试掘并发掘了渔浦门遗址和东门口码头遗址,先后发掘了宋元明州市舶司遗址、高丽使馆遗址、孔庙遗址、永丰库遗址、天宁寺(唐国宁寺)东塔遗址、天封塔地宫和塔基遗址、天妃宫遗址、海

① 南越王宫博物馆筹建处,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南越宫苑遗址》,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年;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广州市北京路千年古道遗址的发掘》、《广州市中山六路黄金广场汉六朝唐宋遗址》、《广州中山四路致美斋南汉与宋代建筑遗址》、《广州市大塘街宋代河堤遗址发掘简报》,《羊城考古发现与研究(一)》,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年。

② 《广州文物志》第一章“遗址、旧址”第一节“古遗址”,第25~29页。

③ 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宁波市唐宋子城遗址》,《考古》2002年第3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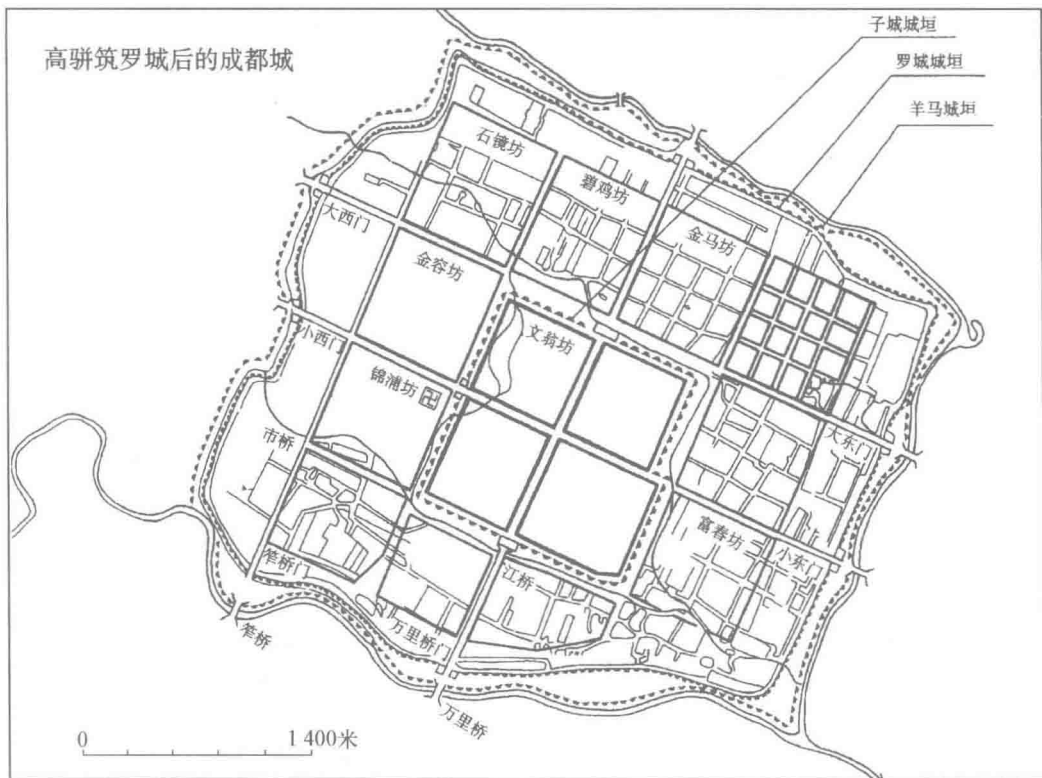
图九 南宋时期明州城复原示意图

曙长春塘遗址等^①。

西南地区的地方城市,以往经过考古调查比较清楚的有唐末高骈展筑、宋以降一直沿用的成都城^②。唐末高骈在成都旧城的基础上,修建了罗城,使成都城的布局从东西并列的“日”字形变成了内城外郭的“回”字形,随之整顿了城市水系,划定了里坊。城内由纵横街道划分成十六个坊(图一〇)。宋代的成都城,即沿用了唐末五代的成都城,在其基础上发展而来。近年成都市配合基本建设做了大量的考古工作,为了解唐末以降的成都

① 林士民:《浙江宁波东门口罗城遗址发掘收获》,见《再现昔日的文明——东方大港宁波考古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宁波和义路遗址发掘报告》,《东方博物》第1辑,1997年;《浙江宁波市舶司遗址发掘简报》,《浙东文化》2000年第1期;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宁波宋代孔庙遗址发掘简报》,《浙东文化》1998年第2期;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宁波元代庆元路永丰库遗址发掘简报》,《浙东文化》2002年第2期;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宁波唐国宁寺东塔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7年第1期;林士民:《浙江宁波天封塔地宫发掘报告》,《文物》1991年第6期;浙江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宁波天封塔基址发掘报告》,《南方文物》2011年第1期;林士民:《浙江宁波天后宫遗址发掘》,见《再现昔日的文明——东方大港宁波考古研究》;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永丰库元代仓储遗址发掘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年;浙江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宁波海曙长春塘遗址发掘简报》,《南方文物》2014年第3期。

② 孙华:《秦汉时期的成都》,见《文明起源与城市发展研究》,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4年;孙华:《唐末五代的成都城》,见《宿白先生八秩华诞纪念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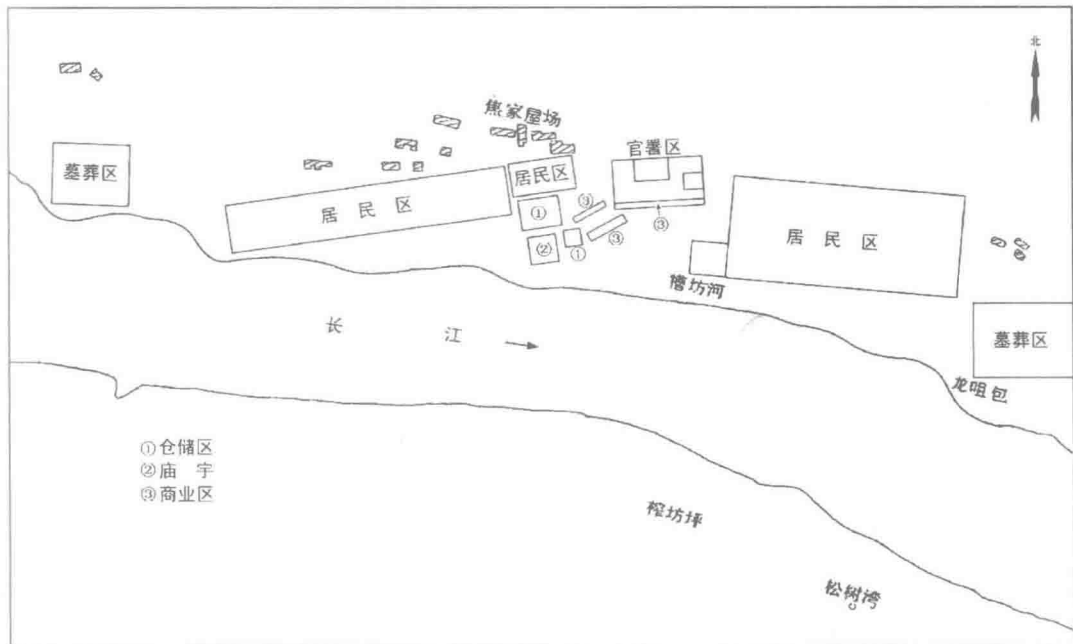
图一〇 唐宋时期的成都城

城提供了新的材料^①。

随着配合三峡建设的大量考古工作的展开,这一地区许多重要遗址被全面发掘,为认识这一地区的地方城镇提供了极好的机会,地方城址中以巴东旧县坪最具代表性。旧县坪遗址是隋到北宋年间的巴东县治所在地,南宋迁治江南后仍一度作为临时的县治治所。经过考古踏勘和发掘,两宋时期的巴东县治遗址,未发现城垣遗迹。官署区位于一椅子形

① 成都市博物馆、四川大学博物馆:《成都指挥街唐宋遗址发掘报告》,《南方民族考古》第2辑,成都:四川科技出版社,1990年;成都市博物馆考古队:《成都罗城1、2号门址发掘简报》,《南方民族考古》第3辑,成都:四川科技出版社,1991年;成都市文物考古队、四川大学历史系:《成都市上汪家拐街遗址发掘报告》,《南方民族考古》第5辑,成都:四川科技出版社,1993年;雷玉华:《唐宋明清时期的成都城垣考》,《四川文物》1998年第1期;黄晓枫:《成都市江南馆街唐宋遗址发掘简报》,《成都考古发现(1999)》,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年;谢涛:《成都市1994~1995年城垣考古》,《四川文物》2001年第1期;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成都市人民中路发现的唐代钱币窖藏》,《成都考古发现(2001)》,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年;谢涛:《成都唐宋时期城市考古》,见《文明起源与城市发展研究》;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中同仁路城墙遗址发掘简报》,《成都考古发现(2002)》,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中同仁路城墙遗址第二次发掘简报》,《成都考古发现(2003)》,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年;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内姜街遗址发掘报告》,《成都考古发现(2004)》,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年;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下东大街遗址考古发掘报告》,《成都考古发现(2007)》,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年;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清安街城墙遗址发掘简报》,《成都考古发现(2008)》,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年;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江南馆街唐宋时期街坊遗址》,见《中国考古学年鉴·2009年》,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年;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博物馆新址发掘简报》,《成都考古发现(2009)》,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年;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下同仁路城墙遗址发掘简报》,《成都考古发现(2012)》,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年。

的山坳,中部为衙署。衙署建筑地处遗址北部中心,是一处地势平坦但海拔较低的地方,居于全城的核心。以衙署为中心,东为居住区,西为商业区、仓储区、庙宇区和居住区,东西两处墓葬区分布在居住区两侧^①(图一一)。除了考古发掘外,还集中对三峡工程淹没区的忠州、涪州、丰都、开县、奉节、巫山、归州、大昌、万县天生城、云阳盘石城等城址进行了考古调查。这些城址,可以分为山地城、平地城和抗蒙元山城三类,布局各有特点。虽不全是宋代城址,仍对了解三峡地区的城址类型及其所反映的问题多有裨益^②。



图一一 北宋巴东县治平面布局示意图

针对宋代北方地区的新建城址近年也进行了考古调查和研究工作,在考古调查的基础上,对宋代北方地区的聊城、长清、文水、桐柏、岚县、隆平、黎城、昌邑、惠民、淳化、乡宁十一座城址,按照古今重叠型城址的考古研究方法进行了初步复原。通过复原,这些城址按照其街道类型可以分为十字街类型、丁字街类型及一条主街类型三类。又基于复原研究的成果,进一步对宋代北方地区新建城址的主要成因及其背景,宋代北方地区新建城址的类型、布局及其所反映的城市规划,宋代北方地区新建城址的规模和等级,从宋代新建城址看北方地区隋唐以降不同时期城址的变化等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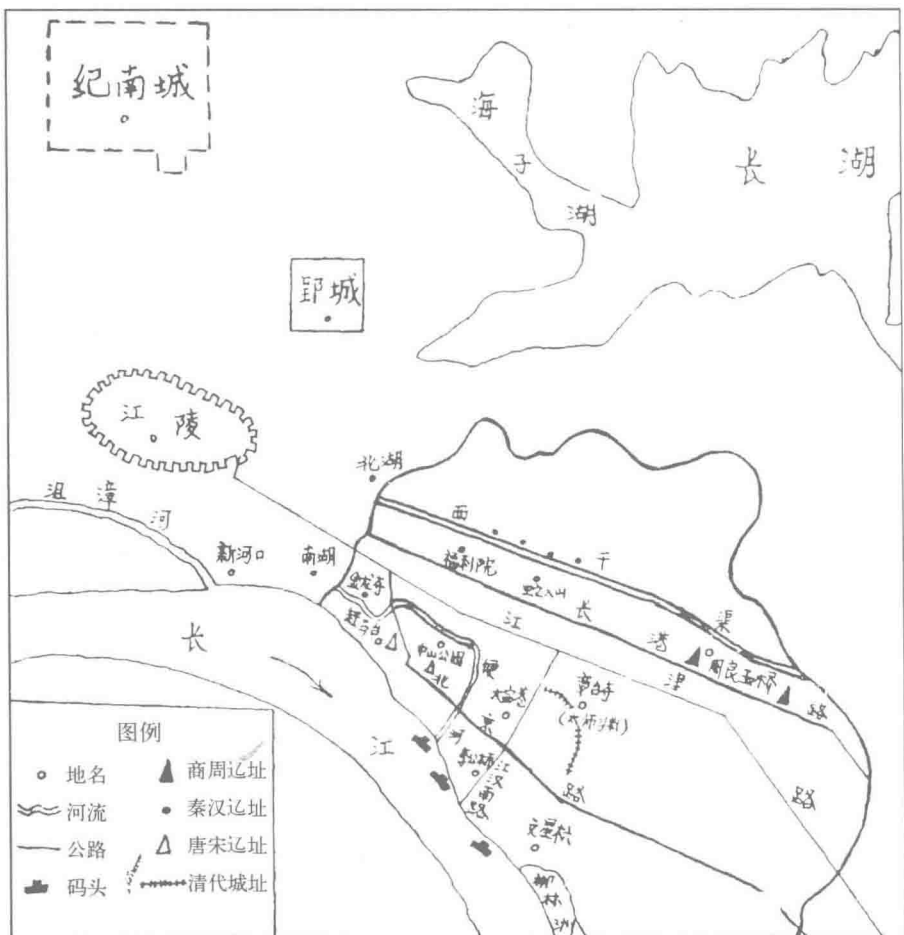
宋代城市的一个特点是经济类型城镇的兴起。开展过考古工作的商业城市,以湖北

① 王然主编:《巴东旧县坪》,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年。

② 杭侃:《三峡工程淹没区的城址类型及其所反映的问题》,见《新世纪的考古学——文化、区位、生态的多元互动》,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6年。

③ 杭侃、王子奇:《宋代北方地区新建城市的考古学研究》,见《2012 东北亚古代聚落与城市考古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331~362页;王子奇:《陕西淳化县城址调查》,《华夏考古》2015年第3期。

沙市为代表,它从唐代以来的沙头市发展成为了沿江一条街的沙市城^①(图一二)。市镇如江西省吉安市永和镇,它是吉州窑所在地,旧日街迹窑址今仍历历在目,“六街三市”的布局基本保存了下来,前店后厂,是典型的宋代制瓷手工业城镇^②(图一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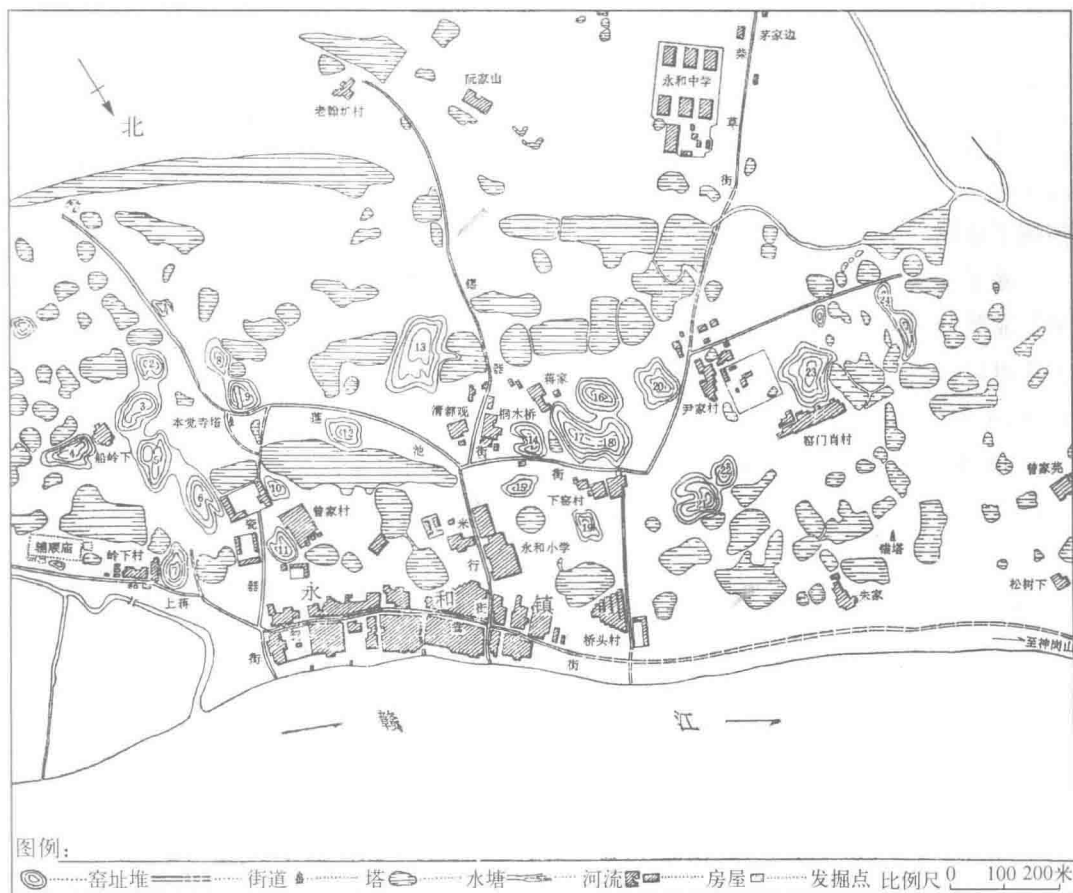
图一二 沙市平面图

河南省叶县文集遗址也是一处比较重要的市镇遗址,遗址一直从唐代晚期沿用到元末明初,绝大多数遗迹都位于金代至元代初年的文化层之间。从发掘的遗迹看,一条古道东西横贯遗址中部,将其划为南北两部分,道路南侧有一岔道通往澧河码头,房址大多集中在道路两侧,向路开门,除道路和房址外,还发现大量窖藏、水井、灰坑等遗迹^③。

① 袁纯富、范志谦:《从出土文物看古沙市位置的变迁》,《江汉考古》1984年第3期。

② 李德金、蒋忠义:《南宋永和镇的考察》,见《中国考古学会第七次年会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年。

③ 王龙正、王立彬:《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叶县文集遗址》,见《2007中国重要考古发现》,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年;王龙正、王立彬、张明力:《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叶县文集遗址发掘收获》,见《发现中国——2008年100个重要考古新发现》,北京:学苑出版社,2009年;夏然蔚:《叶县文集遗址出土瓷器研究》,首都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



图一三 永和镇平面图

山东省板桥镇也是一处进行了较多考古工作的市镇遗址。板桥镇遗址位于山东省胶州市旧城区,唐武德六年(公元623年)设镇,宋元祐三年(公元1088年)升板桥镇为胶西县治所,兼领临海军使,并设立板桥市舶司,为宋代北方唯一一处市舶司。1996年和2003年先后在胶州市政府宿舍和云溪河改造、湖州路市场建设施工中发现了数量巨大的宋代铁钱和大量宋、金、元、明、清时期的瓷片。2009年在原胶州市政府所在地又发掘了宋以来的公共建筑基址群和客栈及转运仓储设施,出土了十余吨宋代铁钱和大量门类较多的遗物^①。

此外,还对部分地区的市镇进行了考古学调查与研究。三峡地区经过发掘的十余处唐宋早期市镇的初步研究显示,根据其成因和功能的不同,可以分为因交通优势而兴起的商业市镇、因资源开发而形成的市镇、因商品经济和交通运输的繁荣而形成的复合型市镇

① 青岛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胶州古板桥镇考古发现宋代建筑基址》,《中国文物报》2010年8月27日第4版;王磊、周丽静、张晶:《山东胶州板桥镇遗址考古发现及相关问题》,《齐鲁文化研究》第9辑,济南:泰山出版社,2010年。

以及服务型市镇四类^①。江南市镇在宋元时期得到了很大发展,明清时期进入繁盛阶段。但对江南市镇的考古学研究工作十分有限。目前经过考古学调查的市镇包括朱家角、新场、同里、黎里、新市、南翔、菱湖、濮院等,通过从水系交通对市镇的影响、市镇核心区形成和变迁、各类建置分布、镇内行业分布等方面的细致分析,初步将这些市镇大体划分为经过超经济力量人为规划过和顺应经济与地理、交通等因素自然发展起来的市镇两大类,并强调了市镇兴起性质及市镇产业结构变化对市镇产生的影响^②。

除了上述这些城镇遗址以外,宋代还有一些军事性质的城址。宋夏对峙时期,因为军事的需要,在今宁夏、陕西、甘肃等地区修建了大量堡垒。宁夏地区涇源、固原等县的堡垒大体可以分为平地的和山地的两大类型。平地城大多平面方形或长方形,山地城则据险而筑,平面形状不规则^③。陕西地区也发现了大量的军事堡垒,如银州城、麟州故城、吴堡古城、通秦寨古城、葭芦寨故城、太和寨故城、罗兀故城、怀宁宅故城、安达城故城、石城子遗址、丹头寨故城、万安寨故城、安塞堡故城、龙安寨故城、保安军故城、得靖寨故城、金汤故城、铁边城遗址、白豹古城等^④。川峡地区还保留了大量抗蒙元山城,对这批山城陆续进行了田野调查,如合川钓鱼城、金堂云顶山城、广安大良城、兴文凌霄城、宜宾登高城、剑门苦竹寨、三台寨、南宋运山古城、苍溪大获城、平昌小宁城、万州天生城、云阳盘石城、合江神臂城、宋白帝城、南川龙岩城、通江得汉城、巴中平凉城、渠县礼义城、大竹荣城、富顺虎头城、彭水绍庆城、合江榕山城、乐山三龟九顶城、南充青居城、重庆多功城等^⑤。

其中,合川钓鱼城、宋白帝城遗址等近年还进行了考古发掘。钓鱼城遗址位于重庆市合川区东城半岛的钓鱼山上,其地雄关高峙,控扼嘉陵江、涪江、渠江三江。钓鱼城遗址由

① 李映福:《三峡地区早期市镇的考古学研究》,成都:巴蜀书社,2010年。

② 杭侃:《宋元时期的地方城镇——以中原北方、川东和江南地区为例》,《燕京学报》新23期,2007年;张薇:《太湖东南地区市镇的考古学调查研究》,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

③ 鲁人勇:《固原地区北宋五城寨遗址考》,《固原师专学报》1990年第1期;余军等:《涇源县永丰唐宋古城》,《固原县马园宋城址》,《固原县卧羊山宋城》,《固原县头营宋元城》,《固原县二营宋夏城》,《固原县胡大堡宋城》,见《中国考古年鉴·1993年》。

④ 戴应新:《银州城址勘测记》,《文物》1980年第8期;《重要古城址》,《文博》1973年第3期;刘缙:《北宋西北地区城寨述论》,《文博》2004年第5期。

⑤ 胡昭曦:《南宋云顶山石城遗址》,《成都文物》1984年第1期;胡昭曦:《广安县宋末大良城遗址考察》,《四川文物》1985年第1期;丁天锡:《宜宾地区境内的三座抗元山城遗址》,《四川文物》1985年第2期;何兴明:《南宋抗元遗址——剑门苦竹寨》,《四川文物》1985年第3期;蒲国树、陈世松:《宋末涪州治所——三台寨考察》,《四川文物》1987年第3期;邹重华:《金堂宋末云顶山城遗址再探》,《四川文物》1988年第5期;陈言昌:《南宋运山古城遗址》,《四川文物》1989年第4期;王峻峰:《大获城遗址》,《四川文物》1989年第4期;唐唯目:《钓鱼城古战场遗址》,《四川文物》1989年第6期;马幸辛:《平昌发现南宋小宁城遗址》,《四川文物》1990年第3期;滕新才:《宋末万州天生城抗元保卫战》,《四川文物》1993年第1期;潘友茂:《云阳磐石城初考》,《四川文物》1993年第1期;王庭福、罗萍:《南宋神臂城遗址》,《四川文物》1993年第1期;薛玉树:《宋元战争中四川的宋军山城及其现状》,《四川文物》1993年第1期;陈剑:《汉白帝城位置探讨》,《四川文物》1995年第1期;张钦伟:《南川抗元名城龙岩城》,《四川文物》1996年第4期;岳钊林:《通江得汉城宋元以来的战略地位》,《四川文物》1997年第4期;马幸辛:《宋元战争中川东北山城遗址考》,《四川文物》1998年第3期;唐长寿:《乐山宋代抗元山城三龟九顶城初探》,《四川文物》1999年第2期;龙鹰、王积厚:《南宋抗元遗址淳祐故城》,《四川文物》2003年第2期;郭健:《南宋抗元遗址——礼义城》,《四川文物》2007年第3期;侯博等:《南宋四川山地滨江防卫型城池营建研究——以重庆多功城为例》,《后勤工程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符永利、蒋九菊:《四川抗蒙战争遗产:广安大良城考古》,《大众考古》2014年第6期;蒋晓春等:《四川省蓬安县运山城遗址调查简报》,《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

钓鱼山山顶环城、南、北一字城墙及南、北水军码头共同组成,另有连接水军码头的城墙一道,现存各段城墙总长 7 320 米(图一四)。环山城城墙连接镇西门、始关门、小东门、新东门、菁华门、出奇门、奇胜门,城墙上散布小型马面和排水孔多处。城内分布有护国寺、古军营、皇城、武道衙门及石照县衙、大草房、范家院子等一批宋元时期遗址^①。



图一四 合川钓鱼城平面示意图

南宋白帝城坐落在瞿塘峡夔门西口,面积约 5 万平方米。平面不规整,略呈马形。城门 6 处,东、西、北各一处,唯靠近长江的南方有大小不同的两座城门,另有水门一座。所谓的东西城门也位于东西两头南边靠近长江的地方,可以反映出此城对长江水道的依赖。宋瞿塘关和子阳城间,以一字城相连,从一字城的走向看主要为了防御西来之敌。整座山城前带大江,后枕重岗,城内高差 401 米,城的大小和城墙走势受地形的制约,城内布局被自然山势分割成独立的三大片区。城附近还发现了几处军事城堡或设施^②。

总体看,这些山城都依山形水势、据险而筑,多位于交通要道,彼此呼应联系,侧重防御设施如一字城、羊马城等设施的修筑。有学者进一步对已调查的山城进行分析,一方面根据其行政等级将其归拢为制司一级、路一级、府州军监一级、县一级四个等级,一方面又

① 袁东山、蔡亚林:《合川钓鱼城古战场遗址取得重要发现》,《中国文物报》2010 年 2 月 5 日第 12 版;袁东山、蔡亚林:《重庆合川钓鱼城南一字城遗址》,《中国文物报》2012 年 2 月 10 日第 4 版。

② 袁东山:《瞿塘天险战略要地——奉节白帝城遗址的勘探与发掘》,见《永不逝落的文明——三峡文物抢救纪实》,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 年;袁东山:《白帝城遗址:瞿塘天险 战略要地》,《中国三峡》2010 年第 10 期。

根据这些山城所在地的地理形势将宋代四川地区的山城划分为:山顶类型、半岛类型、岛洲类型、复合类型四个类型^①。

近年来,还针对土司政权的城址进行了不少考古工作,其中以贵州遵义播州土司关围遗址群的考古工作最具代表性。关围遗址主要分布在以海龙囤为核心区域的周边山巅。海龙囤遗址位于汇川区高坪镇海龙囤村,遗址现存城垣总长 5 773 米(含“新王宫”院墙 477 米),所围合的面积近 38 万平方米。其中,囤顶“大城”南、北城垣为南宋时期遗存,应即杨文为抗蒙而建的“龙岩新城”之一部分。东西两端现存的关隘及与之相连的城垣,以及“新王宫”等遗址,应该是末代土司杨应龙于明万历年间“重建”^②。养马城遗址位于海龙囤东面 2.5 公里,地处数个小山头围合而成的山间盆地中,平面呈不规则形,现存城墙周长约 3 500 米,城内面积约为 35 万平方米,发现城门 6 处,多设于山间垭口处,有叠涩顶和拱券顶两类,经勘查和局部清理,“衙门”遗址大致始建于宋,明代扩建^③。此外还对海龙囤遗址周边的其他关围遗址进行了考古调查和勘测工作^④(图一五)。

此外较为重要的还有湖南永顺县城老司城遗址,为永顺宣慰司数百年的司治所在,也是湘、鄂、渝、黔土家族地区规模最大、保存状况最好的土司城址。自 1995 年起,对该城址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勘察和发掘工作。文献记载今老司城的营建始于南宋初年,目前发掘揭露所见虽主要是明清时期的遗迹,但考古发现亦表明在明代修建老司城宫殿城墙以前,老司城已有很长的居住过程,而且存在高规格建筑^⑤(图一六)。与老司城类似的还有时代稍晚的唐崖土司城址,近年也做了大量的考古工作^⑥。

这些土司城址是西南地区古代族群维持自己政权而建设的山地建筑典范,不少城址延续时间长、规模宏大。山城的建设者充分利用地形地貌,人工建筑与自然地物相得益彰,构成了完整的山地军事防御体系,成为公元 10 至 17 世纪山地城市和建筑的杰出范例^⑦。

近年来,围绕一些宋代地方城市的核心区域——特别是子城和衙署,也做了不少考古工作。西南地区如重庆老鼓楼衙署遗址,该遗址位于重庆市渝中区解放东路望龙门街道巴县衙门片区,2010 年起进行了考古发掘工作。发现的南宋时期大型夯土包砖式高台建筑基址,是南宋淳祐二年(公元 1242 年)四川制置司移驻重庆后的治所所在,成为南宋

① 孙华:《宋元四川山城的类型——兼谈川渝山城堡寨调研应注意的问题》,《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 年第 2 期。

② 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遵义市汇川区文体广电局:《贵州遵义市海龙囤遗址》,《考古》2013 年第 7 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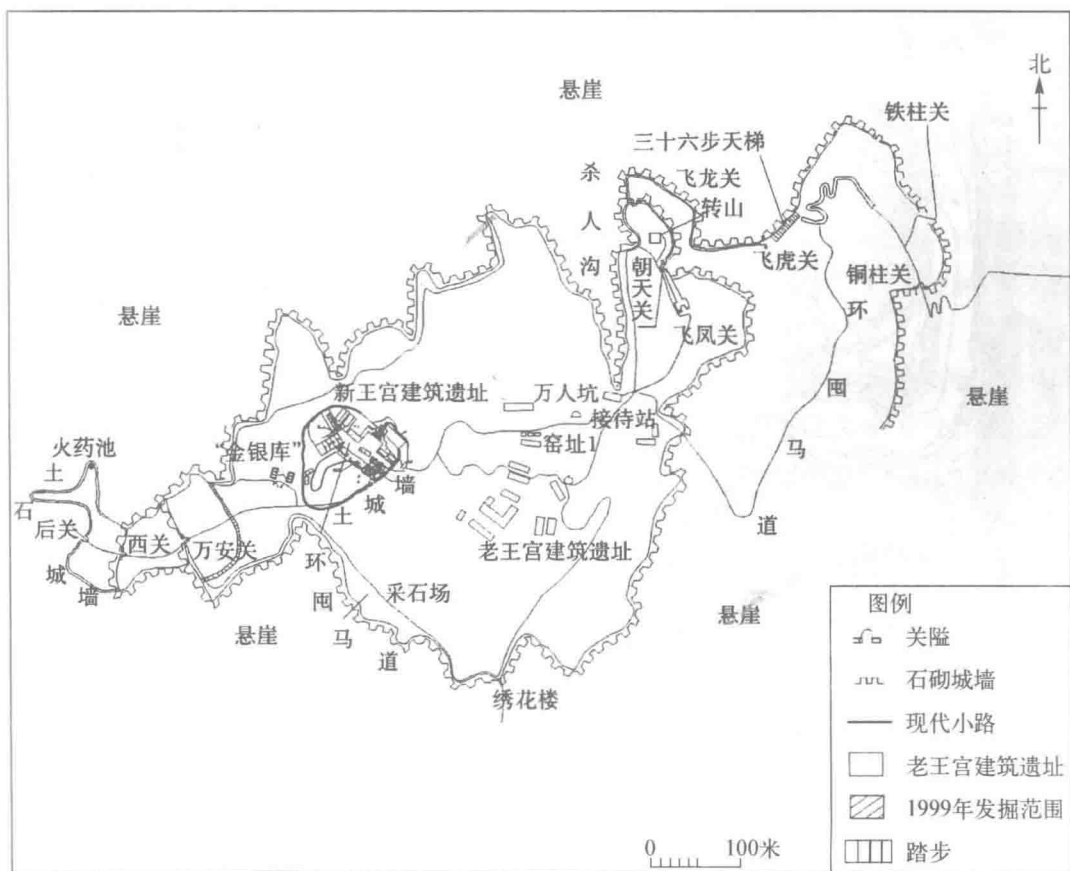
③ 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贵州遵义市养马城遗址调查与试掘简报》,《考古》2015 年第 11 期。

④ 周必素、李飞:《贵州遵义播州杨氏土司遗存的发现与研究》,《考古》2015 年第 11 期。

⑤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永顺老司城》,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 年;柴焕波:《老司城考古二十年》,《中国文化遗产》2014 年第 6 期。

⑥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北咸丰唐崖土司城址调查简报》,《江汉考古》2014 年第 1 期;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咸丰唐崖土司城址衙署区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14 年第 3 期。

⑦ 孙华:《土司遗址:中国古代山城的杰出代表》,《世界遗产》2013 年第 1 期;孙华:《中国土司遗产考古》,《南方文物》2015 年第 1 期。



图一五 贵州遵义市海龙囤遗址平面图

川渝山城防御体系的战略枢纽和指挥核心。南宋以降,老鼓楼衙署遗址兴废频繁,但作为衙署一直沿用至清^①。北方地区如针对绛州署的主动性考古发掘工作。绛州衙署现存大堂是元代遗构,绛州城也是自隋唐以来古今沿用的城址,历来为学术界所瞩目,近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对绛州衙署遗址进行了发掘,对大堂院落及其南侧区域和东、西两路院落局部进行了揭露,明确了绛州州治衙署自唐代设立后,历代皆在原址沿袭使用^②。江南地区则如对湖州子城的考古发掘工作^③,对金华子城的调查工作等^④。这些考古工作虽只针对城址局部,但因为对象是城市的核心区域,对于了解当时城市的发展也是相当重要的。

① 袁东山、蔡亚林:《重庆市渝中区老鼓楼衙署遗址》,见《中国重要考古发现·2011年》,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年;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老鼓楼衙署遗址——重庆城市考古的重大发现》,《中国文物报》2013年1月18日第6版。

② 杨及耘、王金平:《考古发掘确定山西绛州衙署遗址年代和布局》,《中国文物报》2014年5月23日第8版;《山西绛州州署遗址考古成果丰硕》,《光明日报》2015年11月27日第9版。

③ 郑嘉励、陈云:《湖州唐宋子城东城墙遗址》,见《浙江考古新纪元》,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年;郑嘉励:《湖州市唐宋子城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2009年》。

④ 蒋金治、朱佩丽:《金华子城考》,《东方博物》2014年第2期。



图一六 永顺老司城遗址平面图

三、小 结

通过上述内容,可以反映出宋代城镇考古发现与研究工作中的一些特点:

首先,最突出的特点即是宋代城镇考古工作的不足和零散性。这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已开展考古工作的城镇案例不仅绝对数量有限,且若在全国背景下检讨,则其在当时全国城市中所占比例很低这点格外突显。《旧唐书·地理一》记载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分全国为十道之后,全国共有州府三百五十八,县一千五百五十一^①;《新唐书·地理一》记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户部账记全国凡郡府三百二十有八,县千五百七十三^②。这大体反映了初、盛唐时期李唐政权所控制地区内州县的数目。北宋国土面积比唐代缩蹙,郡县数目较唐有所减少。至北宋末收回燕山府和云中府之后郡县数目有所增长,《宋史·地理一》记载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天下分路二十六,京府四,府三十,州二百五十四,监六十三,县一千二百三十四”^③。相较于数量巨大的唐宋时期的城址,已开展过考古工作的数十处案例所占比例就很小。即便是相较于北宋末所辖一千二百余处县级城市,已开展考古工作的宋代城址大约仅相当于当时宋代全部城市数量的

① 《旧唐书》卷三十八《地理志一》,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384页。

② 《新唐书》卷三十七《地理志一》,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960页。

③ 《宋史》卷八十五《地理志一》,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095页。

5%。要从考古的角度进行宋代城市的工作和研究,给学术界留下的空白仍是巨大的。

第二个方面则是目前已经开展考古工作,特别是工作较为充分的宋代城市,有限地集中在都城如开封、临安、洛阳,以及若干区域性中心城市如扬州、宁波、广州等。更多的工作主要配合基础建设展开,很少有有计划性的调查发掘,针对某一区域展开的有明确学术目的、有系统的调查则更少,除了三峡地区的地方城镇、西北地区的军事堡垒和抗蒙元山城、土司城址以及宋代北方地区新建城址的调查研究外几乎完全没有。甚至三峡地区地方城镇的调查研究工作也不是学术界的主动工作,而是配合三峡水库建设进行的;西北地区军事堡垒调查研究工作的开展也很不充分。

若在考古学科内部来看,先秦时期的城市考古工作历来是考古学界的重点研究内容,工作相对较为充分^①;近年来秦汉时期的城市考古工作随着材料积累日益充分,综合性的城市考古研究也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②。与之相较,魏晋南北朝以降的历史时期城市考古工作,尽管有学者进行呼吁并做了初步探索,但除都城遗址和少数重要地方城址以外,未能引起学术界的充分重视,已经成为中国古代城市考古学上的短板。

这个现状严重限制了从城市考古角度认识宋代城镇的广度和深度。针对古代城镇的研究,考古工作是一项重要的基础工作,为其他学科领域(如城市史、城市历史地理、古代城市规划等)研究的深入展开提供了坚实的一手资料。作为城镇研究基础性工作的考古工作开展有限,直接导致了学术界对于宋代城镇的规划和布局缺乏足够深入的认识。这类工作,是其他学科不可能完成的,必须由考古工作者完成。这类工作,过去没完成,今天也必须补上,否则研究就无法深入推进,进一步的讨论就无法开展。关于此,可以举北京城为例。徐苹芳先生主持了元大都和明清北京城的考古工作^③,并对其进行了长期而系统的考古复原工作^④。之后,在这样扎实的工作基础上,徐苹芳先生总结了古代北京不同时期的规划特点。有关内容,不多赘述,仅举一例。譬如徐先生指出元大都采用大街胡同布局的街道规划在当时是先进的,而中央衙署的分散布置则是不合理的,因此前一点也一直被明清北京城沿用到了解放前,后一点则在明迁都北京后改变了^⑤。正是从一点一滴的考古工作积累起,从不同历史时期的城市考古复原工作扎实做起,徐苹芳先生才可能得

① 请参许宏:《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钱耀鹏:《中国史前城址与文明起源研究》,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李鑫:《商周城市形态的演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

② 请参周长山:《汉代城市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刘庆柱:《汉代城市与聚落研究》,见《汉代城市与聚落考古与汉文化》,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年;白云翔:《秦汉时期聚落的考古发现及初步认识》,见《汉代城市与聚落考古与汉文化》;徐龙国:《秦汉城邑考古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

③ 徐苹芳执笔:《元大都的勘查和发掘》,《考古》1972年第1期;后与《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1986年)“元大都遗址”条合并重写收入《中国历史考古学论丛》,台北:允晨文化实业公司,1995年。

④ 徐苹芳:《明清北京城图》,北京:地图出版社,1986年。徐苹芳:《元大都枢密院址考》,见《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徐苹芳:《元大都御史台址考》,见《中国考古学论丛》,北京:科学出版社,1993年;徐苹芳:《元大都中书省址考》,《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新第6期(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三十周年纪念刊),1997年;徐苹芳:《元大都路总管府址考》,见《饶宗颐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香港:翰墨轩出版有限公司,1997年;徐苹芳:《元大都太史院址考》,见《宿白先生八秩华诞纪念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年;以上诸文皆收入徐苹芳:《中国城市考古学论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

⑤ 徐苹芳:《古代北京的城市规划》,见《环境变迁研究》第1辑,北京:海洋出版社,1984年。

出这样的科学结论。

与此同时,其他学科关于宋代城镇的研究,则已颇为广泛和深入^①。议题所讨论的范围不断拓展固然是一方面,近年来一些关键议题的讨论不断深掘使其更加接近城市史的核心问题则是另一方面。后者例如学界对宋代城市管理问题的讨论,在以往研究基础上进一步展开了有关宋代城市的厢、坊、界、隅等概念的讨论,一方面涉及与前代城市兼具明确空间形态和管理职能的“坊”的关系问题,一方面也同时触及当时城市的行政和军事管理问题;同时也在逐渐厘清宋代城乡居民户籍管理分治制度的基础上,明确了宋、辽已经开始出现了“拥有确定的行政区域和专门行政机构并实行独立行政管理”的“建制城市”,并且在金元得到普遍执行;这些问题,当然是宋元时期随着城市发展城市管理所做的重要调整,是当时城市史上的关键议题^②。再如关于宋代城市的人口,宋代城市的税制、市制以及与此相关的市场形态等研究^③,虽然是经典的经典城市史议题,但近年来学者也颇多发明,使得问题更加清晰。

与此相比,宋代城镇的考古学研究就不仅显得冷清,更关键的问题则在于由于研究欠深入,使得讨论的问题仍停留在20世纪中后期研究所讨论的“坊市制”的破坏和开放“街巷制”的确立这个层面。难以深入的同时,鲜有能够真正触及这一时期城市史研究核心问题的成果出现。不得不说,这和宋代城镇考古工作十分缺乏是直接相关的,目前的宋代城镇考古工作尚没有全面展开,必须从带有“普查”性质的田野考古工作开始。只有当这一阶段的工作基本完成,各个地区的城镇面貌基本清楚,再加上不同时代的城镇考古工作都有了可以对应的成果,考古学角度的城镇研究工作才可能真正深入。

正是基于以上认识,笔者认为在进一步开展宋代城镇的研究工作时,应该首先重视作为基础工作的宋代城镇考古调查和研究工作。特别是针对一定区域有计划的城镇调查与研究工作。同时,对包括宋代城镇在内的魏晋南北朝以降的历史时期城镇进行广泛的考古调查和研究工作,还有十分现实的考虑。目前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飞速发展,城镇化进程不断加速,城镇化和古代城镇保护之间的矛盾不断加剧。2013年福州修建地铁过程中穿过汉代冶城遗址是这类事件中引起社会关注较大的一例。笔者在山东聊城调查时,也正遇到聊城为了进行城市建设,打着“古城保护和改造”的名义对古城以“推平头”的方式进行严重的破

① 历史、历史地理、建筑史等相关学科近年有关宋代城市的研究,成果颇丰,学界已有若干综述论及,兹不一一赘述,请参看杨贞莉:《近二十五年来宋代城市史研究回顾(1980~2005)》,《台湾师大历史学报》第35卷,2006年,第221~250页;宁欣、陈涛:《唐宋城市社会变革研究的缘起与历程》,见《“唐宋变革”论的由来与发展》,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93~357页,删改后以《“中世纪城市革命”论说的提出和意义——基于“唐宋变革论”的考察》为题,刊载于《史学理论研究》2010年第1期,删改后又以《唐宋城市社会变革研究的缘起与思考》为题,载于《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1期;包伟民:《唐宋城市研究学术史批判》,《人文杂志》2013年第1期。

② 包伟民:《宋代的城市管理制度》,《文史》2007年第2辑;韩光辉:《宋辽金元建制城市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鲁西奇:《唐宋城市的“厢”》,《文史》2013年第3辑;刘未:《宋代城市的界》,见《历史上的杭州与中国城市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杭州,2013年11月。另,关于韩光辉一书的讨论和批评,请参包伟民:《唐宋城市研究学术史批判》,《人文杂志》2013年第1期。

③ 包伟民:《意象与现实:宋代城市等级刍议》,《史学月刊》2010年第1期;包伟民:《宋代城市税制再议》,《文史哲》2011年第3期;包伟民:《宋代州县城市市制新议》,《文史》2011年第1辑。

坏。类似的情况屡有发生,甚至有学者指出历史文化名城是公布一座毁一座,如何在城镇化建设中解决好城市遗产的保护问题已成为当务之急。然而,有效保护古代城镇,必须建立在充分认识古代城镇的基础上,考古工作是认识和研究古代城镇的基础工作。以往考古学界针对古代城镇,特别是地方城镇的工作远远落后于实际需要,也落后于历史地理、建筑史、旅游等相关学科;现有形势下,对古代城镇展开考古调查和研究工作具有强烈的紧迫性。

其次,根据前述对宋代城镇考古工作的总结可以反映的另一个特点是,既往研究深化了我们对于宋代城镇“多样性”特点的认识。徐苹芳先生曾将宋元时期的地方城市按照城市的布局和街道系统分为四种类型:方形十字街式、方形(或长方形)丁字街式、长方形纵街横巷式、不规则形^①。从已开展工作的宋代城址看,若依城市的布局和街道系统分类也大体可归纳为以上几种类型。徐苹芳先生也曾指出宋代城市发展中,经济型市镇的兴起是其突出的特征之一;此前杭侃先生亦撰文指出“宋元城镇的类型远较隋唐丰富”^②。通过近些年考古学界针对宋代市镇、军事堡垒和土司城址的考古工作的进一步展开,更加深了我们对于宋代城址多样性的认识。

再者,在宋代城镇考古工作中,一个突出的特点是绝大多数城镇都属于古今重叠类型的城址。目前已开展考古工作的宋代城址中,除了罗州城、巴东旧县坪和部分军事堡垒、土司城址外,基本都属古今重叠型。

古代城市相较于其他考古遗址来说,面积大,很多重要的城址又文化层堆积厚、延续年代长。例如良渚古城占地面积约 50 平方公里,郑州商城遗址面积达 25 平方公里,汉长安城仅城内即 36 平方公里,邳城包括它的城内和推测的外郭城范围将达到约 100 平方公里。这就给城市考古工作带来了巨大困难,进行城市考古工作,不仅耗时长,而且难以采用考古发掘的方法全面地揭露城址。另一方面,具体到古代城市的田野考古和研究工作,不同城址之间又有所不同。徐苹芳先生指出,中国古代城市可以按照其保存现状大体上分别为两类:一类是处于田野中的城市,其中相当大比重的是早期城市如殷墟、汉长安城等;另一类正是如本文所述的唐宋以后的城市,绝大多数都属古今重叠式的城址^③。

这两类城市,由于其保存现状的不同,开展考古工作的条件因而不同。在田野中的城市遗址,尚可能根据考古研究工作的需要,进行有计划的调查、勘探与发掘,从而较为全面地搞清楚城址的整体情况。而古今重叠型城址由于现代城址的叠压,则不具备这一条件,想仅仅依靠考古勘探和发掘来解决问题,显然是不现实的,因此需要总结一套工作方法来

① 徐苹芳:《宋元明考古·宋元明时期的城市遗迹》,见《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第488、489页。

② 杭侃:《宋元时期的地方城镇——以中原北方、川东和江南地区为例》,《燕京学报》新23期,2007年。

③ 徐苹芳:《元大都考古序论》,未刊稿,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2002年、2009年授课讲义。孙华先生曾在2013年8月举行的“十至十二世纪东亚都城和帝陵考古与契丹辽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大会发言中,将古代城市按照“古代城市所在区位”和“城址目前的地貌景观”将古代城址分为城镇、城郊、乡村和荒野四种类型,并指出不同类型的城址“开展考古的方法也有一定差别”,“需要遵循不同的工作方法和研究途径,才能准确地采集到有关历史时期城址的信息,从而复原当时城市的基本面貌”。但从考古调查与研究工作的实质上看,仍然主要是“城镇”和“乡村”两类,孙华先生则根据其具体考古工作中可能遇到的技术方法的差异,又将其进一步细化。

开展工作。通过赵正之、宿白、徐莘芳等先生对元大都和一些地方城址的工作,逐渐总结了一套工作方法,即如徐莘芳先生在《现代城市中的古代城市遗痕》一文中所说的,“要研究古今重叠的城市,唯一的方法便是考察分析现代城市中所遗留的古代城市痕迹,并据以复原被埋在地下的古代城市的平面规划和布局”^①。前举众多实例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研究方法的正确性和重要性,在未来的城镇考古研究工作中,不仅要重视广泛的田野考古工作,还需要在积累考古勘探和发掘材料的基础上,进一步展开在此方法指导下的宋代城镇复原和研究工作。

最后,近年来宋代城镇考古研究也出现了一些新动向。一方面是学术界更多地对宋代城镇的某些要素予以关注,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即是针对宋代子城和衙署的考古勘察和发掘,这方面的考古工作关系到宋代城市的核心区域和子城制度的历史变迁,是重要的研究课题。另一方面则是学术界对某一特定类型的城址进行了更多的考古工作,对抗蒙元山城(特别是钓鱼城和白帝城)、土司城址的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工作都属此类。亦属此类的还包括对宋代新建城址的研究。由于古今重叠型城址不易做出全局性的变动,既使我们具备进行古今重叠型城址复原的基本方法论前提,同时又限于相当数量的宋代城市在前代旧城的基础上改建而来,新的城市规划受旧城的约束,不能完全表现出来,因此研究宋代城市时应特别注意平地新建的城市可以解决这一问题。这类城市由于不受旧城的约束,能够比较充分地反映当时的城市规划和建城思想。基于这一视角的研究,也可以视作宋代城市考古研究中的新动向^②。

通过上述小结不难看出,以往宋代城镇的考古工作,已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但其不足也是明显的。正如前述,无论是出于学术研究自身发展的要求,还是出于当前城镇化加速的挑战下做好古代城镇保护工作的需要,我们都必须迫切地进一步加大对宋代城镇的考古工作,这是摆在所有中国考古学界同仁面前的共同课题,还需要考古学界的长期努力。

^① 徐莘芳:《现代城市中的古代城市遗痕》,见《远望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华诞四十周年纪念文集》,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年;宿白:《现代城市中古代城址的初步考察》,《文物》2001年第1期;杭侃:《古今重叠型地方城址的考古方法刍议》,见《庆祝宿白先生九十华诞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年。

^② 除前引杭侃、王子奇:《宋代北方地区新建城市的考古学研究》外,与此文切入点类似的研究还可参见刘未针对蒙元创建城市的研究:《蒙元创建城市的形制与规划》,《边疆考古研究》第17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313~342页。